

# 云北峰:违背父命毅然参加革命

◎呼和浩特革命人物⑥⑤

云北峰,蒙古族,1915年出生,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北什轴村人。

云北峰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土默特旗小学读书。1936年,云北峰来到南京政治学校蒙藏班求学。在校期间,他和同学们经常传阅革命刊物《新生月刊》,这本刊物介绍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云北峰深受启发,想去蒙古学习革命本领,回来报效祖国。1936年秋天,云北峰回到家乡,联系上去过蒙古的高凤英,主动和他商议去蒙古学习的事情。高凤英听了他的想法后说:“我就是为了抗日救亡,才从蒙古回到家乡的。”劝他留在家乡参加抗日斗争。于是,云北峰打消了去蒙古的念头,在蒙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以教员身份做掩护,开始了地下抗日活动。

1937年,白海风在归绥组建蒙旗保安总队。云北峰经同学多淑秀(白海风的妻子)推荐,参加了蒙旗保安

总队,他在这里认识了乌兰夫、朱实夫、纪松龄等共产党员。10月,日军进犯绥远,蒙旗保安总队在归绥城大黑河沿岸迎敌,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因敌众我寡,部队向包头撤退。途经北什轴村时,云北峰回家看望父母,父亲不同意他远离家乡。这时,奎璧、奇峻山找到云北峰,建议他担任殿邦在归绥成立的巴彦塔拉盟保安队。云北峰自知忠孝两难全,为了革命,毅然离开了家乡,和奎璧参加了巴彦塔拉盟保安队,奎璧担任任殿邦的副官,云北峰担任中队长。

1938年秋天,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和师直骑兵营的一个连在李井泉、姚■率领下挺进大青山,很快与高凤英、杨植霖、贾力更等人领导的抗日武装汇合,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并在塔布子、把什、鸟儿素、沙尔沁、台阁牧等村庄建立了活动地点。1940年春天,贾力更和云北峰去托县争取一支地方武装参加抗日斗争。

他们从塔布子村出发向南来到大黑河,河里结冰已经开始消融,两人快到对岸时,贾力更掉进河里。云北峰上前拉他也掉进河里,两人挣扎着爬上岸时,浑身都湿透了。尽管两人付出很大努力,但这次争取地方武装参加抗日最终没有成功。1939年至1941年,大青山地区党组织先后组织了九批蒙汉族青年去延安学习。云北峰是1940年第四批去的延安,一起去的还有赵戈锐、康军(女)、王淑英(女)、云志厚、李勇(女)、李应标、李清(女)、赵维新、张财旺、胡铁麟、徐史、黄静涛、黄静波(女)、锐军、黑志清等人。云北峰到达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民族学院民族研究班做研究工作。194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7年秋天,党组织派遣云北峰去加强准格尔旗革命工作。1948年,准格尔旗遭受旱灾,颗粒无收,云北峰来到准格尔旗,组织农牧民开展生产自救,积极培养干部,发展党员,很快稳定了局势。1948年7月,中共伊东工委在准格



尔旗推磨梁成立,云北峰担任书记。伊东工委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云北峰负责统战工作。当时,郡王旗的地方武装很复杂,有奇全喜的国民党警三区部队、奇宝喜的保安队、奇兆禄东官府的保安队,只有把这些武装团结过来,才能尽快实现郡王旗的解放。1949年1月,奇全喜听说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连续失败,感觉国民党大势已去,不投靠共产党就无路可走,于是,他主动与中共东郡工委联系,要求和谈。2月24日,双方代表共26人在准格尔旗沙圪

堵镇开始谈判,中共伊东工委的代表有高增培、王悦丰、高平、马富纲、寒峰、云北峰。双方经过4次谈判,于28日达成协议。虽然达成协议,但是奇全喜仍然犹豫不定,抱着观望的态度,脚踏两只船,两头互相对应付,派人向董其武请示:“解放军如果逼近郡王旗,我们怎么办?”董其武指示:“咱们要行动一致。”1949年7月2日,解放军警备旅分区一个团,解放了伊克昭盟的扎萨克旗。7月3日,伊西工委周仁山、马富纲率领伊西支队挺进扎萨克旗新街镇。7月4日,伊东工委高增培、高平率领伊东支队进入新街镇。8月4日,伊东工委高增培、高平和榆林39团团王仁法率领部队从扎萨克旗出发,前往郡王旗接收起义。8月5日,郡王旗解放。

1949年11月26日,伊克昭盟第一届临时代表大会在扎萨克旗新街镇召开。会议选举产生包括云北峰在内的伊克昭盟人民自治政务委员会。1950年2

月1日,郡王旗人民政府成立,云北峰担任旗委书记。1951年,云北峰参加了河套地区土改工作团,协助河套地委解决土地改革中的民族关系问题。1952年到196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河套地委副书记,河套公署专员,乌兰察布盟盟委书记、盟长,乌兰察布军分区政委,内蒙古城建局局长、党组书记,内蒙古农牧林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内蒙古党委常委等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云北峰遭受迫害,身心受到极大摧残。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云北峰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主持内蒙古农牧林办公室工作。1978年,云北峰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1979年,云北峰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同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他是中央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领导小组成员。1986年8月12日,云北峰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呼和浩特市党委党校供稿)

## 民国乘火车带钞票限重量

近年中国铁道事业发展举世共睹,相比于民国时的铁路,那可是天壤之别。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火车站纷纷贴出了一张令人目瞪口呆的公告。公告大意是:今后旅客携带钞票(法币)乘车时,重量需控制在30公斤以内,超过规定重量的一律不得带上火车。这一规定突破了民国铁路行李运输制度的限制,反映了当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社会状况。

民国时期,旅客随身携带的物品除了可以放置在搁物架或者车座底下的

以外,一律作为行李通过专门的行李车运输。什么物品可以放置在搁物架或者车座底下呢?范围非常有限,一般都是小的物件,如路上看的书、吃的零食等。总之,这些物品的体积必须很小。之所以有如此的规定,是因为民国时期坐火车不实行对号入座,如果物品的体积过大,就容易侵占座位,挤占过道。

除放置在搁物架或者车座底下的物品外,其余体积比较大的物品,如箱子、



竹筐、戏班的服装道具等均被视为行李,经行李房过磅、起票后放在行李车上运输。行李必须是旅行用品,以买卖为目的的商货通常

会被视为包裹,运价也比行李贵。

此外,民国铁路还特别规定:“金银、货币、纸币、有价证券及其他贵重物品,概不照行李运输。”也就是说,钞票只能随身携带。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行李员看守能力有限,这些贵重物品一旦丢失,铁路部门承担不起责任。同样,旅客也不放心把自己的钞票放在行李车里。

1946年,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高潮,钞票(法币)

急速贬值。“拿着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成为常态,人们上街买东西需要携带成堆的钞票。这种社会状况很快影响到了铁路,很多火车站不断出现这样的奇景:旅客扛着麻袋、皮箱,装着大量钞票,不行李房过磅,直接就往车厢里扛。车站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处理。事情的尴尬之处在于:按照规定钞票不能作为行李运输,自然不需要交行李房过磅,旅客所做的事情并没有错。然而装满钞票的麻袋或者皮箱体积很大,如果允许携带上车,那么车厢内将变得非常拥挤,

旅客没有多少立足的空间。

权衡之后,铁路部门想出了应对策略。具体办法如本文开头所说,就是限制携带钞票的重量。最初的规定是可以携带10公斤以内的钞票,随着通货膨胀的加剧,后来改为30公斤以内。这些钞票并不是免费运输,而是按照“包裹”的形式起票自带,安全则由旅客自己负责。

铁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样的特殊规定反映了当时恶性通货膨胀对铁路的影响。无论在中国铁路史还是货币史上,它都是一个奇观。(据《文史博览》)

## 古人“睡觉”很讲究

古人对每一种深、浅度或姿势的睡眠,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坐着打瞌睡,叫作“睡”;闭目养神未睡着,叫作“眠”;趴在茶几、案头上睡觉,叫作“卧”;仰在炕上睡,叫作

“寝”;躺着睡且睡着了,叫作“寐”;刚刚睡醒,睡眠惺忪,叫作“觉”或“寤”。由此可知,在古代,“睡觉”并非是一个词,“睡”指闭眼睡,“觉”指睡醒了。

唐代时,“睡”和“觉”

开始在典籍、诗歌作品中连用,如白居易《早兴》诗有“睡觉心空思想尽,近来乡梦不多成”之句,由于刚刚睡醒,所以有很多思乡的梦都“夭折”了。

在古代,“睡”和“觉”

连用起来,也不是指今天的“睡觉”,而是指“睡醒”。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写的就是杨贵妃睡醒后的惺忪状态:刚刚睡醒,发髻未及梳理,花冠

尚未整理好,便下堂来了。宋明两代,“睡觉”一词依然指“睡醒”。宋代理学家程颢的《偶成》诗写道:“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写的是早上醒来的情景:一觉醒来,

红日映窗。明代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也多次出现过“睡觉”一词,均指睡醒。如“快去朝议房里侍候,倘若睡觉,亟来报知,切勿误事”。——一旦他睡醒了,就马上来告诉我。文/刘凯